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二期 ——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2e)

【内幕揭秘】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舒 云
【研究报告】在历史的视界中看“文革派”	伍 国
【研究评论】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徐友渔
【运动记愧】巴金忏悔——重读《随想录》	徐百柯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内幕揭秘】

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 舒 云 •

黄永胜：1955年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

吴法宪：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

李作鹏：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

邱会作：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认为卷入“九一三”事件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虽然逮捕（称离职反省）是在11天以后的9月24日，但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都被监控了，基本上无所事事。1980年审理“两案”时已经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逃跑有关系，可惜这已是十年铁窗之后的事情了。其实，早在1973年底，主持实际工作的林彪专案组副组长纪登奎就向中央报告了审查结论：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毫无关系。

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 事发当晚，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

李德生回忆，9月12日晚，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参加了会议。

实际并不是这样，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这一天晚上来开会的有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康生、黄永胜、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等。吴法宪没来，他是宪法起草领导小组的。费四金说的也不完全对，邱会作也没有来，他和李作鹏是9月13日凌晨4点左右从家里被叫到人民大会堂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黄、吴、李、邱四人中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

9月12日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办公，也就是说黄、吴、李、邱没有聚会，如果要搞阴谋活动，好办得很，黄永胜一个电话几个人就可以集中活动，完全以工作名义。而且那时也没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只要有事就办公。可以说，9月12日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逗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四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这时就到了中午的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后，黄在看未阅的文件。黄住在西山9号，房子下面就是军委前指。若大的工事，司、政、后指挥系统，电台、军委一号电话台、发电机、水井、一个加强团几个基数的武器、弹药，三千人半年的粮食、肉类罐头、蔬菜罐头以及被服、药品，办公区、警卫区、大礼堂，一应俱全。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总理事先也不知道，政治局的成员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可见原定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时黄、吴、李、邱的心情还不错，一是他们对主席的检讨，在主席那里过了关，虽然，主席在南巡时对刘丰等人说“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李作鹏从刘丰口中得知），有些不理解，但总无大碍，无非再接着检讨。主席喜欢占上风。二是黄、吴、李、邱经过艰苦努力，经过和江青几次舌战，终于同意军队解放一批干部，国庆节要上天安门亮相，诸如张宗逊、杨勇、梁必业、肖向荣、李雪三、张贤约、王诤、王恩茂、吴克华等等。三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黄、吴、李、邱均有重任，黄为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也是副总理，李、邱也是副总理；吴是副委员长，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康生当委员长，而不让朱老总当委员长，总理还叮嘱这几个将军在会上不要再议，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们几个的。

文革前政治局开会，书记处开会，按中办的安排进行，文革时就不同了，毛主席走上一线，亲自统一指挥党、政、军。因此，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3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中午饭，开会到下2、3点，然后回去吃晚餐，睡觉。但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晚上8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警卫参谋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各首长的警卫人员在外面大厅坐着聊

天，费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电话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1、2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4、5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回家。

江青到会议厅后，会还没有开，她拿着一副扑克，张罗着打扑克。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扑克？吴法宪明白江青是在试探，反正心里没鬼，玩就玩。张春桥和江青一家，黄永胜和吴法宪一家，结果黄永胜和吴法宪赢了。

◇ 王医生接了三个有背景的婴儿

“九一三”事件前的那一段，也奇了，“三〇一”医院妇产科同一间产房连着出生了三个有背景的婴儿。这三个有背景的婴儿又先后住同一间病房，在妇产科一进门右拐头一间，八九平方米，如果不说，和别的产房没有什么两样。有意思的是，三位产妇都是由一个姓王的老医生、妇产科副主任接生的。第一个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一定要把主席的孙子保下来，每天要报告母亲邵华的体温和状况，要当成政治任务。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夫人胡敏是邱办主任，她指示“三〇一”医院的院长靳来川亲自管理。毛新宇出生的那天，胡敏亲自到产房坐镇，生怕有半点闪失。这还不算，每天还要去产房问长问短。幸亏是毛老人家的宝贝孙子，要是林彪的孙子，那可就坏了，“九一三”事件后还不成了大罪状。

第二个婴儿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孙子黄小波，这是黄家和刘兴元家的后代。胡敏也一样，生产的那天一直在产房坐阵。

8月31日，到邱会作自己抱孙女时，胡敏还是如此，当然规格不由自主地要降许多，邱家产妇住了四、五天就出了院。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邱燕恒12天了（这是邱家和张霖之家的后代，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是在文革中唯一被打死的被毛主席和江青亲自点过名的部长，邱会作、胡敏同意这个红“黑”结合的婚事，真是高风亮节，难能可贵，这件事周总理、叶群都帮了大忙），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是婴儿第十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老丈母娘来了，在西郊机场工作的路光爱人的表姐夫一家来了（仅为此一来，就关了几家，转业都不准，做复员处理），炊事员老刘师傅也来了。西山上还有个战士炊事员，做了一大桌子菜，但人多不够吃，又下挂面，又买馒头，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晚饭。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紧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听国防大学讲课的录音。但心里却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如何。他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国防工办的会议，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邱从李作鹏那里得到毛泽东南巡的一些讲话内容后，几个人都没有跟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漏子。家人吃完晚饭已经是下午6、7点钟，邱会作回来了，他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大儿子拿着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子女的来信，讲给邱听，说谢的爱人陆慧明阿姨还关在南京大学地下室受摧残，希望邱能救救陆阿姨。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到“301”看牙，他就和母亲胡敏下山回总后大院了。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张军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睡着没多久，凌晨4点左右，邱会作被秘书叫醒，说周恩来总理来电话，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李作鹏是警卫员掺进会议室的，他的药劲也没过。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来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鹏接到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他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五点左右，周恩来宣布开会，他对江青的态度大为转变，总理对江青客气地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总理以为江青知道了，其实她不知道，因此毫无反应），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惟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1980年审理“两案”时，老战友万毅代表中央探监时对他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谁知道邓小平、彭真并没有放过他

9月17日下午，总理来了一个电话，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他是保我的，并让我上西山，去给黄做做工作，要他坚守岗位，不要撂挑子。我和路光到了西山，我让路光先去看看黄，黄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向黄转达了总理说保我们的话，黄若有所思地说“话是这么说呀，文章不一定这么做。”黄的思想水平是很高的。黄说“顶多把我和吴胖子抓起来，你和瞎子不会有事，共产党嘛。你放心，反江青的飞扬跋扈，祸国殃民都推倒我一人身上。”我们不愿意谈这些烦心的事，就谈我们在哪里相识，并肩战斗的往事，边说着我们边掉泪，后来我们都大哭起来，感到痛快。

◇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种“自留地”

李作鹏9月12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不管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没有让三叉戟起飞。三叉戟是强行起飞，并没有经过调度室。李作鹏不服气，为什么把三叉戟起飞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我也不知道他往苏联飞，他要是往北京、广州、大连等地飞，什么白天飞、晚上飞，有什么了不起。总理都说“不能打呀，他是党的副主席。”毛主席都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你们都没办法我怎么有办法？！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林走对我有好处，还是不走对我有好处？不走对我有好处嘛，不走他还是副统帅嘛，我放他走干屁！你周总理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

李作鹏一直在海军大院，根本不知道人民大会堂和北戴河的前前后后，林彪去哪？为什么

不让林彪的飞机起飞？全没讲。李作鹏没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根本想不到，他只是照本宣科，把总理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如果周恩来多透露一句话，李作鹏也会强调。以后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李作鹏说，以我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四个半小时录音带为准。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各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对于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来说，除了军委办事组的集体活动外，“自留地”都种得差不多了。而李作鹏这段时间基本上就不在家。他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一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日、8日还在武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可是，你是政委，也不是司令员，军事指挥上没有你的事嘛。你为什么要亲自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让秘书或司令部办不行吗？也许是总理亲自交代的，李作鹏也要亲自处理。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了安眠药睡了，这一次因为吃了双倍的安眠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一般都是前半夜，是不是与昨晚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罢了。李作鹏支持叶剑英这一个观点。

毛泽东曾经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他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但是，放跑三叉戟的罪名最终还是算在了他的头上。

◇ 那个晚上，吴法宪吓得魂都没有了

9月12日，对于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个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毛泽东指示，“四届人大”召开前要先开九届三中全会，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1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山住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吴法宪起床后，就叫车和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吴法宪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晚饭前，他先到京西宾馆听邱会作谈毛泽东南巡讲话，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之后吴法宪回到空司办公楼，下午就这样紧张张过去了，晚上吴法宪还有一大堆事情。当时正开着一个会议，晚上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这个谈话结束已经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了，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了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

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它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他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了，你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我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五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这是胡萍听了潘景寅的假话），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1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拦截是完全做得到的，林拦截下来，对党有好处，对我们的国际声誉有好处，对黄、吴、李、邱更有好处，就是对后来造谣，把水搅浑没有好处。一会，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它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

我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2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我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 9月12日黄永胜接见林立果了吗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9月13日他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与林家有关，按一等专机准备的。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14日，邱会作回到家，扒着大儿子邱路光的耳朵小声说，林彪跑了！邱路光都懵了，瞎说什么呢。但老爹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开玩笑，他（他和黄春光从幼儿园就是同学，一生都是哥们）马上给黄春光打电话，说电话里不方便，叫他回西山一趟。黄春光还以为邱路光叫他玩，心想，你休假没有事，我可还要上班，有什么要紧事？你快过来，真有事，出大事了！邱路光说“树林子起火了，树叶子也烧光了。林子、叶子，林、叶”，黄春光恍然大悟，那时哪有汽车，骑自行车回了西山，这才知道情况如此严重。黄春光第一个念头是看老头在什么地方，问一问父亲黄永胜。这时，黄永胜还被“圈”在人民大会堂。

查来查去，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终于查到，9月12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9月12日那一天。因为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一直在西山。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本来要抱个“大金娃娃”，顿时，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就会“顺杆爬”，反正黄永胜已经倒了，再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费四金什么好处。坚持说真话，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还会有一个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这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最后，专案组组长纪登奎使出“杀手锏”，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始终说真话，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要不然，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面就有了“铁证”，黄永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

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他们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搞上飞机。

费四金原来是广州军区41军121师的，跟黄永胜从广州到北京，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时间最长的，1968年跟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工作人员都先后走了，费四金也在交班，准备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接班的小汤基本上都接了，只剩下账本没接，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也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遇，再也没走成。费四金交完班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结婚证领了，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手了，喜糖什么的也买了，却被突然关了起来。专案组认为费四金是黄永胜的心腹，把他当成重点。

黄永胜从人民大会堂回到西山，费四金觉得他情绪低落，也知道跑了一架大飞机，以为吴法宪跑了，因为没看见吴法宪来。直到费四金进了学习班，才知道黄永胜有问题。逮捕黄永胜时费四金不在，小汤跟着去的人民大会堂。费四金住在城里，临走头一天，黄春光抱着孩子来了，说首长有事走了，我们没有生活费，首长还有没有生活费？费四金说有是有，都在西山。就领他们到西山取，看门上贴着封条，知道事情不好。警卫不让进，后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剑飞专门请示中央，才让他进了。进去以后费四金就失去了自由。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道“临时”了四年，先是关在亚疗一年，然后到团河劳改农场三年，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75年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升”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如果费四金承认9月12日黄永胜见了林立果，那就立了“大功”，决不会是这种待遇，但费四金至今不悔。

◇ 黄永胜被关在秦城，为什么不愿意与家人见面

黄春光回忆，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我想说，我知道父亲的事会把我怎么样，我不知道又会把我怎么样。我从侧面分析，我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我也在烧，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策反信毛主席不是批过了？批过了，也一样可以抓。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四年。林办的秘书，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里“挖”东西。

放出来重新给我分配工作。本来我是副团级，分配到司令部管理处军粮城生产队担任副队长。我问，是队长指导员管我，还是我管他们？当然不会让我干长，没多久让我转业，三个弟弟也都转业了。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要去看。终于说可以看，母亲在外地（安徽）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不是监狱不让见，而是父亲不见我们。自从关进监狱，这么多年了，父亲从来没有见过家人，他不想见吗？但父亲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我们既然千里迢迢来了，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监狱看得特别严，不许照相，别人还有与父亲在监狱拍的照片，我们没有。但那次见面给我印象极深，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父亲从小打仗，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不是他胡说，根本不知道谋害毛主席。事实与罪名无关，打倒谁是黄永胜签字？没有签过任何一个打倒的文件。黄永胜领导专案组是接过周总理和杨成武的，他们都基本搞定了，没有更多的事了。开除彭德怀党籍，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这就算迫害？七一年“九一三”以后，也没有解放彭嘛，彭七四年惨死，还让搞化名。父亲说，请律师有什么用？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没事，我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从我们到北京来就抵制。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1年，父亲在青岛生活一年半，我和三弟调过去照顾他。

1983年春节前被发现肺癌，4月父亲去世。临死家里连冰箱也没有，只能到外面买些冰块，把冰放在尸体上，等远方的弟弟来最后见一面。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当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父亲最后没有写东西，不写！写什么？人家相信吗？关于“九一三”事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临死父亲只讲了两句话，我没有反毛主席，我没有反党！

◇ 为什么林彪政变不依靠黄、吴、李、邱

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说，总参谋长黄永胜是个主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关系特别密切；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是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

对黄永胜来说，关系密切就成了“罪状”吗？

对吴法宪来说，空军的权力是说交就能交的吗？

李作鹏呢？“两案”审理小组取证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总理不让飞机走，事后很清楚，如果说李作鹏那时放他们跑，也过分。

黄春光认为，父亲不知道林彪为什么跑？一是不同意这样干，二就是同意，也不会干成这样。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认为，“手令”不一定是林彪写的，元帅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两谋”这么大的事情，叫小娃娃干？为什么不叫黄永胜干？他说最冤枉的是黄永胜。

中将黄志勇回忆，9月13日那天，我去透视，里面有人，问是谁，护士说是黄永胜，检查身体。我就不相信这个事，他没参与。

9月24日，黄永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从此失去自由。被抓时，黄永胜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九一三”以后，黄、吴、李、邱都关在卫戍区，在通县和顺义。73年底以后，就没有人再系统地审什么了，76年打倒“四人帮”，全国数我们高兴，可汪东兴这个家伙，想灭我们的口，建议华国锋和叶剑英把我们关进秦城。所谓公审，本质不在我们，而是审毛泽东，审文化革命。

73年底，纪登奎向中央政治局报审查结果，说黄、吴、李、邱与“两谋”、政变无关。有人问手令和林彪通过王飞交给黄永胜的信怎么解释？纪说手令和信根本没有到黄的手上，连王飞都没有看到过。总理同叶帅带纪到毛主席处汇报。主席对纪登奎说“登奎同志，你比我、总理、叶帅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你没有我们老奸巨滑！”

~~~~~

## 【研究报告】

### 在历史的视界中看“文革派”

• 伍 国 •

文革的结束，到2006年就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海内外对文革的研究，处于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中〔1〕。本文尝试对“四人帮”主要人物的思想进行初步探讨，并试图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四人帮”的性质。“四人帮”是把一切政治化，反对纯学术讨论的，但我们对他们却应当可以进行理性的学术讨论，否则很难说就超越了他们；否则，我们也将很难理解江青何以至死不悔，是什么支撑着张春桥的缄默和顽抗，又是什么使得张春桥的去世竟然在网上引发一些人的悼念？需要声明的是，出生于文革后期的我，绝没有任何替谁翻案的政治意图，只希望以一种纯学理的眼光，从历史和政治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或许被一些政治定性掩盖了的历史真实，尝试提出一种阐释，至于读者以为如何，只能笑骂由人。由于主要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四人帮”现象，这篇论文将集中论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不以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作为重点，并将在下文中以“文革派”这个较为中性的词来指称他们。

#### ◇ “文革派”的部分思想管窥

##### 1、“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发表于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探讨了供给制和等级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在于否定重新建立等级制度的做法，主张回归供给制，甚至红军时期的上下完全平等原则。他认为，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处于劣势的红军坚持了“民主主义”原则，他说，“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并且美化供给制说“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文章最后呼吁，要把党的历史上平等和民主的作风“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将战争年代的“平等”绝对化的观点的确是极左的，它当然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更不用说当时不可能提及的市场和商品经济问题，文章的语言也不乏口号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对于建国后的确出现甚至日益严重的干部特权，干部贪污腐化，欺压群众现象，这篇文章无疑是比较敏锐地切中要害而且还比较早的，而作者本人也一位官员。在当时的思想框架内，对特权和不平等的不满无疑只能回到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和马列主义经典论述中寻找答案，例如张春桥就援引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这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的文章一出现，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干部特权问题——也即张春桥所称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一直相当敏感。他认为建国后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绝对是不正确的，也梦想回到某种战时乌托邦状态，以“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高昂的理想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2〕，但由于现实的原因，毛泽东一时也不可能扭转乾坤，不可能立即按自己的构想来改造社会，因此只能将这个问题放在心中，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予以解决，同时暗中寻找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知己，张春桥的文章则刚好碰到他的心坎上。就毛泽东而言，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他把一切等级思想和制度，腐败等问题一概归为“资产阶级”，把官僚集团称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3〕，事实上把体制和法律层面问题完全意识形态化了，并最终蜕化为权力斗争的一部分。破除干部和高干子弟的特权思想，也是江青耿耿于怀的一个问题，不管她自己究竟作得怎样，或者有多少真诚性，毕竟把这个问题面对面地向老干部们提了出来。在1967年4月1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讲了著名“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后，对军队的高级干部们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个会议的召开，是在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成员被逮捕之后，江青显然是以人民的代言人和毛泽东的代表的双重身份在为高干们敲警钟，她质问道，“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4〕陈永贵说江青，“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江青还对陈永贵自称“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5〕

## 2、姚文元对吴晗的批判

把姚文元那篇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作是文革初期政治斗争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揭开文革序幕的重要一步棋，诚然是正确无疑的。但是，这样的政治属性并不能完全掩盖这篇文章本身的思想内容。后世完全有权利提问，姚文元到底写了什么？而吴晗又写了什么？先假定姚文元对《海瑞罢官》剧情的复述基本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吴晗在这部戏中的确在竭力塑造一位封建时代清官的形象，把他写成穷苦百姓的救星。歌颂清官，固然罪不致死，为彭德怀鸣冤，或许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陷害，但这样的戏能有多高明，也是说不上的。即使对今天的稍有知识和头脑的电视观众来说，帝王戏，清官戏也已经引起了相当的反感，因为这样的思想内容的确有可能引导观众向后看，迷信“好官”，而忽视真正的社会问题，而且也的确存在不正面塑造民众的弊病。这个问题，不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一样存在，但确实被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出来。吴晗的冤死是极为悲惨和值得同情的，但他的头脑中对清官和明君的迷信的确根深蒂固。他出版于1965年的《朱元璋传》中，即对朱元璋进行了极力的吹捧，把朱元璋写成从小就聪明能干，“最有担当”，掌权后又如何勤政，如何致力于反腐败，与今天的银屏上“康熙”“雍正”之类的光辉形象实无二致。〔6〕吴晗自己在《自序》中承认，他的《朱元璋传》最初写于1940年代，当时为了“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因此对朱进行了“过分的斥责”和“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这里我们首先看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吴晗本身就是喜欢搞“影射史学”的，因而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向来以当前的形势和需要作标准，并不太严肃。他对朱元璋的评价从斥责到抬高，究竟有没有新的影射目的，不便妄加评论，但这个问题似乎完全出现在了海瑞的塑造中。他把海瑞写成贫民的救星，让剧中的贫民对着“海青天”“感恩戴德，朝夕礼拜”的确既违背历史真实，也显得肉麻。的确如姚文元所说，这种过分和不顾历史事实的拔高不过是加深了人们对“清官”的迷信，歪曲了阶级关系。从纯思想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姚文元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的，其中对“青天”的反感和对“群众”的抬高，与张春桥对“平等”的追求，对等级的痛恨，以及后来江青一定要把“革命群众”搬上舞台，把“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赶走的实践都是相互关联，而且确实具有连贯性。他们确是厌倦了社会生活和文艺舞台上的那些陈旧和腐朽

的观念和模式，并发起挑战。事实上，邓拓究竟是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乃至胡风能否算是独立知识份子，还是仅仅为和周扬争宠，近年来都有论者提出了质疑。这些观点未必都正确，但也提醒我们：从文革“受害者”的角度来评判，也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7）

### 3、“评法批儒”

可以说，对待孔子和儒教的态度，是衡量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指针。在这一点上，江青等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五四以来的激进反孔思潮推向了无以复加的极端。首先，是毛泽东“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8）暂时放开其中针对周恩来的政治目的，“文革派”在拿了毛泽东赋予的尚方宝剑后，的确靠极力贬低儒家和孔子的价值和形象，而抬高法家人物如韩非子，商鞅等人来建立自己的思想武器。“文革派”认为，儒家是主张复古和倒退，因而是反动的，而法家是主张前进，变革旧制度的。从纯粹的学理来说，说孔子是复古倒退并不算错，康有为把孔子塑造成改革者，写《孔子改制考》似乎也并没有成为主流认识，而胡适则在认真考证后指出孔子是殷商的后裔，的确预备复辟的。（9）儒学强调皇权，崇古，始终是现行根本制度的维护者，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文革派”也的确继承了“法家”刚愎自用的特点，而实在缺少儒者的仁义，而且他们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历史作了无情的歪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展览中，被吹捧上天的商鞅被画成携带佩剑，旁若无人地走上秦国朝廷大殿，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文学家沈从文虽然长期沉默，但此时却立即抗议：“这不行……别人会说我们无知”，然而无济于事。（10）今天，“评法批儒”已成为一场历史闹剧，但学者毛志成先生提醒我们，“当年乱搞‘批儒评法’，当然是一场胡闹。但有一点，人们不要忘记：儒学（孔孟一系）毕竟曾经有效地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统治也是一种学术能量。”（11）今日，儒学俨然又“复兴”了，但看见奇装异服，丑态百出的祭孔仪式，装模作样的读经和会讲，的确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这又是不是“统治的学术能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放射呢？

#### ◇ 官僚集团与理学家

从这些思想和做法来看，显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与多数的“老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是相差甚远的。老干部对于革命的资历，功绩，贡献都远远地大于他们，但老干部们在掌握各级政权，成为职业官僚以后，也的确犯了中国历代职业官僚的通病：缺少理想，贪图享受，思想保守，一切以个人得失和家庭利益为先。从分配方式改革来看，老干部必然是等级制度的受益人，他们的子女当然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享受者，从审美习惯看，老干部对旧戏，旧文化的审美趣味，题材和主题有相当程度的依恋，至少不会象而江青等人那样反感。江青所抱怨的光是“福建就搞了十九个京剧团”显然和文革前党政机关鼓励和许可旧戏的态度有关。不过，不论在功劳，资历等任何一方面，江青等人都无法和老干部匹敌，尤其是在一个以枪杆子建立的政权中，没有军事资历的他们自然更加先天不足。他们可以依靠的，首先就是他们鲜明的批判态度和以革命理想的真正继承人自命的信心。在批判的过程中，他们下意识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强调平等，反对官僚，始终坚持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和道义目标，我想这也就是宋永毅先生在张春桥去世后将其称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的原因。（12）这里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思想和政治的阵营——一是老干部，即职业官僚派（以下统称职业官僚），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代表，二是江青，张春桥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即文革派。周恩来应该说是周旋于这两派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特殊人物。

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会发现，理想主义者（也即 ideologue）和职业官僚，即余英时先生所称的“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对垒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漫长而饶有趣味的现象。吴思先生指出，“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

雇员。”〔13〕在现实政治中，这两种功能往往会由两个有不同利益的集团分别来承担，甚至形成对垒。余英时先生分析朱熹的思想和南宋政治文化的大著指出，这种“两个政治取向相反的士大夫集体”的对抗实始自宋代。〔14〕由于宋代是科举取仕完全制度化的时代，大批受过正规经典教育的文人进入政府各级机构，并且在名义上取得了与天子共治的权力。与此同时，这些士人也日渐分为两个阵营，一是思想较为保守，注重自身利益和一般行政的职业官僚阶层，二是一群“以道自命”的道学家，念念不忘恢复“治道”，并以“克己复礼”等道德主义的口号作为号召——这样做的，正是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余英时在此的一大学术突破虽然引起争议，但实在是极富启发性的，这就是把朱熹，陆九渊从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的纯学术传统框架中放回到现实的政治文化中，由此让我们看到，朱，陆所做的学理探讨绝不仅止于学术，其根本目的在于要在现实中“重建一个合理的秩序。”我以为，余英时先生的解释是完全符合儒学作为一种行动哲学的精义的。

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与“官僚集团”的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相反，宋代的“理学集团”秉承儒家理想主义，积极要求改变现状，进行变法。但由于理想主义的理学集团毕竟势单力薄，他们必须寻求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支持，即所谓的“得君行道。”因而，“理学集团”和有着变革念头的皇帝之间有可能产生交集，共同推进改革。余英时指出，当宋孝宗晚年每次试图打破因循守旧的现状，布置积极有为的新局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在这观点上与他相近的理学家。事实上，“理学集团”对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度比之职业官僚更高。另一方面，理学家也极易容易引起职业官僚的反感。在职业官僚的眼里，朱熹等理学家不过是在假借“道”而欺世盗名，以图私利，理学家的自负和狂妄尤其招致嫉恨。当然，双方的根本分歧仍然在于权力的分配，理学家既扰乱了职业官僚期望的稳定局面，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利益。需要强调的是，整个官僚体系与皇权之间也存在一种制衡的关系。

假如以此互动关系来观照好几百年后的晚清，我们就会发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变法集团和职业官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首先，康有为并非是一个职业官僚，而更多的是一个以道自命的边缘士人，他以圣人自许，力图通过“大变”，“全变”，借助西学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实现从“据乱世”经由“升平世”达至“太平世”，最终建立一个大同乌托邦，就理想之远大而言，康有为绝非一般的职业官僚所能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学术意义和思想资源上，康有为并非“宋学”的传人，而是“汉学”中“今文经学”的信奉者，但放在政治文化的范畴内，他其实起了和朱，陆等人相似的作用。在思想层面，康有为也相当看重宋儒，并要求其弟子研读朱陆，而其变法模式也与王安石新政存在诸多相似之处。〔15〕康有为开初在现实当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于1888年赴京应试时，也因为言谈举止的狂妄嚣张引起了北京正宗高级官僚的厌恶。同样，康有为要推动自己的变革理念，必须绕过阻挠他的官僚而直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和支持，寻找交集，而光绪此时也同样地厌恶保守官僚，希望从体制外找到可信赖的人。尽管光绪皇帝本身的能力不言而喻地受到极大制约，而官僚集团有自己的靠山，即西太后，这使得晚清局面与南宋不尽相同，但儒家理想主义的“理学家”必须借“得君”然后“行道”的心态和模式与宋代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康有为对保守的职业官僚是准备杀之而后快，他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看作是“理学家”和较为开明的“职业官僚”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互动，合作，疏离和背叛。但正如王安石变法部分地因为触及大量职业官僚的既得利益而失败一样，康有为从外围闯到皇帝身边发动变革同样是失败的下场。当然，在“职业官僚”内部，也会有开明和倾向改革的人物，如清代的曾，左，李，但显然，他们的改革是片面，肤浅，实际，根本上缺少一个更大目标的。从晚清再往前进几十年，蒋介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手建立，直接指挥的蓝衣社，也还是这样一个性质的青年“理学家”群体，他们试图以高度的忠诚和理想主义，用以最高领袖直接结盟的方式遏制日益腐化的官僚体系，对抗一切有害于道统的思想和政治势力。

◇ “文革派”的性质初探

现在回到“文革派”身上，我们可以作一个和余英时先生所做的性质相似但方向相反的努力，即把“文革派”从政治领域放回到思想理念领域。或许可以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是几个当代的新“理学家。” 毕竟，新中国的历史虽然在政治革命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与前代形成了某种断裂，但是就深层的政治文化心理来说实在还是过去历史的延续。“文革派”中的诸大员自己也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在意识上又不属于那个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山头网络，兼有资历和事功，而且日益趋向保守，享乐，犬儒主义的官僚集团。从经历，年龄来看，江青和张春桥正是深受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影响的一代文人，是中共官僚中不多见的读书人，〔16〕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怀着重建某种秩序的理想，对应古代的“道”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就是金观涛先生所说的“新天道。”〔17〕 对应理学家对“三代之治”的想象的，正是张春桥那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留恋。他们试图挑战既定的规则，想要剥夺老干部的特权地位，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和政治体系，因为站在了这个庞大官僚集团的对面，他们也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极力地鼓吹变革，反对保守和复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四人帮的“变革”方向是反西方，反智主义和非理性的，其部分思想资源是建立在夸张扭曲的历史观上。文革派竭力吹捧法家和贬低儒家，尤其批判程朱理学，文革期间为了批判目的，由中华书局专门出版了有反理学思想的王夫之和戴震等人著作。但是，历史的吊诡正在于，虽然“四人帮”明确反程朱理学，并视之为反动落后，但程朱在自己的时代，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恰恰是激进变革的，而江张二人以革命的名义，在最高领导的直接支持下，打破官僚集团的阻挠，强力推进破坏现行秩序的“文革”，也正是程朱陆及其门徒想干的事。这正如宋代道学虽然被视为反动，然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口号恰恰等同于“克己复礼”，和王阳明《传习录》中所言“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由于资历不够，张春桥同样需要紧紧跟随最高领袖毛泽东，获得毛的庇护，才可能在“行道”的同时也得到自身保障。他们的力量，一是建立在和最高领袖的特殊关系上，二是建立在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上。他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绝对革命化，去除一切私利的乌托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实现绝对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其实是新形势下的“存天理，灭人欲。”“文革派”与老干部们的冲突，很大程度上，还是古时“理学家”和“职业官僚”冲突的再版。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这两派其实都是在同一体制内的，因而，只有所谓民间的“异端思潮”可能才是真正外在于这场“神仙打仗”的争斗，并受到双方共同围剿的。〔18〕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回答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文革在斗死了刘少奇，斗跑了林彪后还停不下来？应当说，一连粉碎了这两大势力的毛泽东绝没有对全局失控，但是，一个符合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理想的“合理的秩序”始终没有实现。一方面，越革社会越乱，越革问题越多，距离目标越远，也就越停不下来了，这一点倒可能是毛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一旦“理学家”掌了权，就必定要把“革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从初期的反“法权”提升到在一切领域进行“全面专政”，〔19〕而因为这个纯而又纯，大而无当的乌托邦原本就是虚妄的，革命也就永远没有了终点。再者，又因为这个官僚集团——“当权派”客观上也是革不掉的，官员中的所谓“小生产者”的意识也就将始终存在。事实上，不仅革不掉，毛泽东其实也很依赖官僚——他本人其实也就是被这个集团推上最高宝座的，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喊“毛主席万岁”的，不正是刘少奇和彭真他们吗？这样一来，在最高统治者，保守官僚，激进理学家的三方角力中，毛泽东处于冲突和平衡的焦点位置。他既是“理学家”们的精神领袖，又是“职业官僚”的最高权威。他本人则既是“虎”，又是“猴”，既有极理想的一面，又有极现实的一面。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他，的确想推进革命乌托邦试验，惩罚日益丧失革命精神的老干部，因此他必须依赖“理学家”来“抓革命”，他对张春桥非常欣赏，如陈永贵回忆所证实的，“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20〕毛泽东与职业官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加以解读：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魅力领袖（charismatic leader），而官僚集团本质上时时阻碍着他施展他的魅力，并使得一般民众日益在各个方面依赖自己。毛泽东本能地感到官僚集团的保守性和对“群

众”的压制，因此他不断凭借个人魅力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明白他必须要靠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来“促生产”，必须给予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这个“理性化”的官僚集团以尊重，因此他最终还得解放干部，把他们“结合”进来，而且最终无法抛弃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沟通和缓冲毛和国家机器的地位和能力实在太特殊了。他更明白，“文革派”的激进和偏执，目空一切已经造成了他们和稳健保守的职业官僚之间的巨大鸿沟，虽然他在精神上或许视江青和张春桥为真正的传人，却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赋予他们。

然而，“理学家”的激进理想主义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首先，他们绝对纯洁的道德理想和革命目标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但疯狂追求的过程和无情斗争的手段却成为全民族的灾难。为了维持已经走火入魔的极端理想主义，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极权，反而把绝大多数人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这似乎可以解释程朱理学在后世成为虚伪的代名词，也可以解释康有为始终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21〕以及“文革派”的最终失去民心。它应证了一切极权主义垮台的教训：“当你试图重新创造的那种道德表达方式一方面与普通大众不相容，另一方面又与知识精英格格不入的时候，你不能希望在全民族范围内重塑道德。”〔22〕但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文革派”在与老干部的对垒过程中，伤害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感情和利益，以至于毛泽东一旦去世，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个激进集团成为众矢之的。“职业官僚”们在战胜“理学家”后纷纷官复原职，并立即自称“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23〕然而，在职业官僚中的开明派致力于改革，并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以来，被革命的“理学家”们一再警示的特权问题，腐败问题，文艺中的“帝王将相”问题，乃至教育，医疗中的贵族化，脱离民众问题却也都全部一步步卷土重来。这绝不是说，文革和文革派的极端做法是有理的，也不能为任何对文革和毛时代的美化和怀旧提供理由。〔24〕问题在于，政治上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法律上对“文革派”的惩罚，道义上对他们的控诉并没有消灭他们指出的弊病，更没有带来这些问题本身的根本解决，因此人们看不到江青，张春桥，陈伯达，乃至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发自内心的忏悔。张春桥甚至敢于在受审前告诫邓小平派去与他谈话的人：“如果将来中共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层，人民将会运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把特权阶层打倒。”〔25〕今天一些人对毛时代的怀旧乃至对张春桥的某种悼念之情，毋宁说就是在发泄对“职业官僚”执政的积怨和不满。

#### ◇ 结语

历史地看，可以说“文革派”的失败是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少数“理学家”在当代环境下的又一次失败，它凸显出一个穿越千年时空的轨迹，即居于中国政治主体的始终是那个趋向保守，自私，犬儒，然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的“职业官僚”群体，无论朝代如何兴替，这个群体都一如既往。他们，正是一切“潜规则”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受益人。诚如吴思所言，“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厉害计算。”〔26〕总有以道自命，以维新为号召，或以“革命路线”，“马列主义真理”自居的少数理想主义者，“理学家”想对它宣战，但最终或因力量薄弱，或因不得法，或因路向全错，他们很难从根本上撼动它，反而成为它的牺牲品。由于这同一体制内的两派斗争都不过是历史惯性使然，因此，当代中国的真正的“制度创新”不是象某些向后看的“新左派”那样对文革中的实践一厢情愿地依赖，怀旧和模仿，而是需要建立在对这一模式进行分析后的彻底超越上，以便最终走向宪政民主。

注释：

〔1〕有的著作侧重于分析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领袖人物，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有的探究林彪事件，如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和吴法宪的女儿金秋教授的《权力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斯坦

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有的集中于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 如徐友渔的知青研究系列, 有的则注意到工人造反派的内部组织和结构, 如王绍光的《疯狂与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有的汇聚受难者的经历, 如王友琴的口述历史《文革受难者》(香港: 开放杂志出版社 2004 版),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回忆性的文字如季羨林的《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年版) 等,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派人物如王力的《王力回忆录》。

(2) 见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http://www.cnd.org/>

(3)《五·一六”通知》, <http://www.cnd.org/>

(4)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http://www.cnd.org/>

(5)《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http://china-shaoshan.com/bbs/showtopic.asp?TOPIC\\_ID=1770&Forum\\_ID=14](http://china-shaoshan.com/bbs/showtopic.asp?TOPIC_ID=1770&Forum_ID=14)

(6) 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 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7) 关于对邓拓冤案的重新解读, 见王彬彬,《邓拓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文学报》2005 年 2 月 18 日; 对胡风的质疑, 见吴永平,《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书屋》2004 年第 11 期。

(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九章, 明镜出版社 2003 年版。

(9) 胡适,《说儒》, 见《胡适文存》, 第四集,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1953 年版。

(10) 凌宇,《沈从文传》, <http://www.mypcera.com/book/ji/bi/scw/index.html>

(11) 毛志诚,《卑贱的“学术”》, 粤海风文化批评杂志, 2002 年第六期。

(12)《旅美中国学人评张春桥》,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 5 月 12 日纽约报导 <http://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53513>

(13)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http://www.bupt.edu.cn/news/book/cxsj/qgz.htm>

(14)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本文写作的动因全来源于此书, 特致以万分谢意。

(15)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929, 932 页。

(16)《江青自述》 <http://www.cnd.org> 在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 江青曾反复在回忆中强调自己早年的好学和广泛阅读。

(17) 金观涛,《创造与破坏的动力: 中国民族主义的结构及演变》, 见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第 139 页,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8)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香港: 田园书屋, 1997 年版。

(19)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http://www.etext.org/Politics/MIM/chinese/classics/zhangchunqiaocw/>

(20)《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21) 关于时人对康有为的评价, 参见拙文《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 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22)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 转引自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950 页。

(23) 谭宗级,《评〈五·一六通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3 年第 8 期。

(24) 所谓新左派似乎力图美化毛时代的种种措施, 见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当代中国研究》2000 年第 4 期。

(25)《旅美中国学人评张春桥》

(26)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研究评论】

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 徐友渔 •

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我读过很多文革亲历者写的自传，写作者有的只是普通的旁观者，多数是有来头的角色，甚至风云人物；作品有的是正式出版的书籍，有的只是尚待发表的文稿；有中文写成的，也有用英文出版的。周孜仁先生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是我读得全神贯注、兴味盎然的一部，也是我愿意推荐给所有想了解文革历史的人们的一部。这部书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而我最为看重的，是它的真实。

周先生文革时期是四川重庆地区一大派“重大815”的头号理论家，并担任《815战报》的主编，他的“大局已定，815必胜”曾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自然也带给他长期的厄运。这种经历化成了本书的气质：书中所记叙的决非琐屑小事，作者思想和文字仍然张扬和充满力度。

重庆地区的文革历史曾经是我研究的重点之一，该地区运动的以下特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派性斗争异常严重，不但造反派和保守派势不两立，而且造反派内部的两派彼此视若寇仇；第二、武斗特别厉害，尤其是因为兵工厂集中，交战中死伤严重；第三、军队的介入和主导作用十分突出，军队和一派组织的结合相当紧密，而军队在文革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周孜仁先生以其在文革时期的年龄、文化程度、介入程度，以及作用、地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重庆文革有始有终的、较全面准确的、点面结合的画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既有各种事件的描写，又有个人内心情感刻画的故事，这是一个可信的故事，也是一个感人的，令人掩卷深思的故事。

在文革中陷入很深，感情投入很多的人，特别是自以为革命的动机是理想和道义而非私利的人，难于以客观的态度、冷静的心态对待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这几乎是文革中当过头头、积极分子的过来人的通病。他们中大多数是诚实的，但他们讲述的文革故事未必可信，不一定是有意撒谎或歪曲，而是没有从具体是非恩怨中彻底摆脱出来。我无意说周孜仁先生对历史已经大彻大悟——事实上，我认为本书对过去的距离拉得还不够，但书中透露出来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说明作者追求历史真实的诚意是充分的。与某些文革头面人物的回忆录不同，周孜仁先生在书中没有为自己辩护，甚至也不屑于辩诬，相反地，倒是有不少自我揭露、自嘲和批判性反省，我想，这是因为近40年之后他的见识大大增进了，思想大大拓宽了，而且，在道义上他始终是自信的。

作者在书的开始说：“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任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我以为，本书的全部文字证明作者是努力作到这一点，忠实记录自己的经历、感情，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不掩饰当时本人、朋友、战友、自己派别的缺陷和阴暗面。

比如，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作者作了如下解剖和总结：“正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与此同时发生的，却是家庭出身先天不足带来的自卑感，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同时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裹足不前。渴望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之所在了。”据我自己的经验，这样的剖析是诚实的、深刻的。

又如，当毛泽东表态反对激进造反派对军队的攻击后，作者所在的“重大815”可以非常骄傲于它的一贯正确，他在《815战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本派，抨击对立派“反军

乱军”的文章，对于某些文革积极分子来说，它们可以证明自己做的好事，这是至今也站得住脚的，但作者却这么评价：“从这些文字，当然可以看出一个小报主编心中再次唤醒的廉价、虚妄甚至有些无耻的愉悦。”我以为，这么严格的自省，是难能可贵的。

我是既卷入文革又研究文革的人，“大局已定，815必胜”问世不久，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注意，2000年得以结识此文作者，我颇感荣幸。我们只在北京见过一次面，交往基本上是通过邮件。老实说，我认识不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与周孜仁先生接触是给我感觉最好者之一。他尽管有才华有能力，却没有因为命运不公、生活不顺、报国无门而自怨自艾；没有因为过去的风云和辉煌而愤世嫉俗、鄙薄现世、一味沉湎于过去；没有因为被无情的政治欺骗、玩弄而看穿一切，放弃理想和热情；而我最为看重的是，他没有因为自己一生的高峰体验发生在文革而留恋它、歌颂它，没有因为自己遭遇的不公和落魄而对历史性转折与进步格格不入；他也不满和批评现实，但丝毫不带文革余孽的左派情绪。对于那些状态不是这么好的昔日英雄，我毫无责备之意，只有同情和痛心，我理解他们的遭遇，知道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和热情（无可讳言，也为自己的幼稚、轻信）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但是，我更为周兄的精神状态高兴，我希望有同样经历的人能够坚持理想、自强不息，我愿意用这句话与大家共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哪怕我们无奈地卑微。

~~~~~

## 【运动记愧】

### 巴金忏悔——重读《随想录》

• 徐百柯 •

《随想录》结束于1986年，是年，“文革”爆发整20周年。20年前，1966年8月10日下午，巴金在上海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作协领导人叶以群的大会。

“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

人们说巴金“过分善良”，并不讳言他性格中的“软弱”或者“怯弱”。软弱的可悲在于，起先打倒别人，后来便打倒自己。就在同一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巴金开始跟着人们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

20年后，巴金忆起这一幕，“想想可笑，其实可耻！”他自问：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于是他郑重地提起“文革”受难者中他的三位亡友的名字：叶以群、老舍、傅雷。

1966年8月2日上午，叶以群跳楼身亡“自绝于人民”，巴金的冤死的朋友中，他是第一个。然而20年后巴金为了找寻这位朋友死亡的记录而翻看自己的日记时，却只看见记流水账的寥寥数语——当时他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他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他“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

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此前一天，他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遭毒打数小时。巴金能记得的，只是老舍死前一个多月两人在北京开会见面时，老舍对他讲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所以巴金说：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

交代呢？

《随想录》中几次提到巴金和日本作家谈及老舍的死。日本作家关注老舍，称他的投湖自尽为“玉碎”。巴金说：“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

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和夫人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9月2日夜，他们写下遗书：“……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巴金写道：“‘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傅雷身上，巴金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

《随想录》中有《知识分子》和《再说知识分子》两篇。巴金说，他很高兴读者通过他的《寒夜》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即使是可怜的小人物汪文宣，他受尽了那么难熬的痛苦，也不曾出卖灵魂。又说：“我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写过不少作品替知识分子讲话，为他们鸣冤叫屈，写他们的艰苦生活，写他们的善良心灵，写他们的悲惨命运……”

巴金怀念他的“马大哥”马宗融时，寄托的正是他扪心自问怀疑丢失掉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风骨和朋友的的情怀。这是《随想录》中字数较多的一篇，蕴涵的感情也很深。马宗融“朋友多，对人真诚，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在他身上巴金看出了“交友之道”。虽然巴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但他记得，马大哥是对他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1947年马宗融所在学校当局纵容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学生，他十分不满，在校务会议上站出来慷慨直言，拍案怒斥。巴金说：“这是他的本色，他常说，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然而巴金承认，自己不曾学到他的长处，“文革”中先是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后来又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回想起来，巴金说了四个字：“愧对亡友”。

《随想录》四十余万言中，除了冲击力强因而广受关注的“还债”、“噩梦”等词汇外，出现频率同样极高的还有“朋友”、“友谊”和“友情”。这些词汇，在巴金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巴金在他所留恋的法国和日本，看到的、感受到的，显然是与“文革”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这里有美好的东西，映照出“文革”中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正常”状态下，巴金的思考也更具活力。所以他一再写道：在国外“清夜深思”，“静夜里在饭店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没有一点噪音来干扰，想起许多事情”。相比之下，“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进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态。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正常生态的毒化过程。

巴金说自己之所以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是因为他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自己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他甚至描述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嘶哑的”声音，反复说道：“债是赖不掉的！”这既是对道德的敬畏，也是对历史的敬畏。

从道德层面，一个人应当“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经历过“文革”的人后来回忆巴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巴金却说：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我的确有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作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

在道德律令背后，其实还有一层历史观照——历史会记录下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所以巴金说：“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这是一种朴素但绝非肤浅的历史意识，尽管他承认自己“不深刻”也屡遭苛责“不深刻”。在这样的历史意识观照下，他接着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这才是道德忏悔。

巴金曾经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当他晚年编选《序跋集》时，他感到了厌倦。因为，几十年的包袱和辫子，要一一清理，这绝不是愉快的工作，“想一笔勾销，一口否定，但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全部摊开展览出来”。经历过这样的自我锤炼，所以他敢于说：《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54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

巴金相信，对于一个文人或者知识分子来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真正的裁判官。但他不得不时时与这样的劝诫抗争：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对于历史记录，巴金一方面是乐观的。“‘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悲观。“健忘的人习惯于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

巴金提倡建立现代文学馆，与《随想录》一样，其实是超越文学的，直指向历史。他说过：“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1966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但“梦总是要醒的”。醒来的巴金执著于为两段历史找寻存放、纪念和思索的场所：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

历史的力量在于：它有一种顽强的趋势，总要露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有对历史的这种敬畏。令人追慕的史家，可以远溯春秋时期，所谓“齐之良史”。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接任其职，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于是也被杀。太史最小的弟弟接任，依旧在史简上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不敢再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浩然正气的表现。

巴金的不断忏悔和两个心愿，一般谓得之于西方人文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接续上了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史”之脉络。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历史叙述、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怀，建立一种经过“文革”淬炼的历史观。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对所有这一切的侏儒化、虚无化过程。

1981年全国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巴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

二十多年过去，巴金百岁诞辰时，不可谓不热闹，而今逝世，又极尽哀荣。不过，巴老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文革”博物馆来纪念巴老也许更适当些。

巴金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过：《随想录》是“在纸面上树立我的‘文革’博物馆”。

他又说：“写完五本《随想录》，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 原载《中国青年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